

语言死亡漫语

戴炜华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语言的快速濒危和死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严重的挑战。认为语言死亡并不是一个新的语言现象, 但对语言死亡的系统研究是社会语言学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 并提供了 Ethnologue 对世界上现有语言的信息, 指出在死亡过程中的语言是濒危语言, 强调一种语言面临的危险并不在于语言死亡本身, 而是一种文化的消失, 人类为这种文化所特有的知识也会丧失。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 语言濒危; 语言死亡

中图分类号: H 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7)04-0326-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7.04.006

Some Thoughts on Language Death

Dai Weihu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endangerment and death of many languages across the world is a global problem. It is also a serious challenge to cultural diversity. The present paper indicates that language death is not a new linguistic phenomenon, but its systematic study is a relatively new field of sociolinguistics. The paper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existing world languages given by *Ethnologue*. It indicates that languages in the process of dying are endangered languages, emphasizing that the danger is not the loss of a language per se but the loss of a culture. As a result, the knowledge that is specific to the culture may be lost.

Keywords: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endangerment; language death

一、语言死亡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课题

人类文明最珍贵的遗产莫过于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生命, 是文化构建、传承和发展的机制。语言也是人类社会的认同源泉和认知机制。语言死亡, 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 人类为这种文化所特有的知识也会丧失。进入 21 世纪后, 世界上

语言的濒危和死亡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迅速, 尤其是少数群体语言和土著语言濒危和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语系、语族、语支、语种的关系失衡, 语言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语言的生命力在于代际传承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当代际传承中断时, 语言就要衰亡。一部分语言的消亡就会破坏语言生态环境的平衡。通用语言越来越通用, 弱势语言在与通用语言接触中, 其使用的范围越来越窄, 甚至逐渐孤岛化。这种情况符合热力学

收稿日期: 2017-08-25

作者简介: 戴炜华 (1936-) 男, 教授。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E-mail: whdai2008@126.com

第一定律：如果一个系统与环境孤立，那么其内能将不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人类的语言在数量上日益减少，但总能量保持不变，其结果必然是强者越来越强，弱者则越来越弱。濒危语言处于弱势地位，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弱，最终就会消亡。

世界上的语言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遗忘和消亡的历史^[1]。语言死亡是语言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语言的存在取决于说话人，当语言的所有说话人消失，语言就死亡。拉丁语和古希腊语通常被认为是“死亡”的语言。因此“死亡的语言”这个概念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死亡有着不同的看法，给语言死亡下一个完整的定义也并不是容易的，什么时候宣布一种语言已经死亡也是一个问题。McMahon（1993）认为：“希腊语和拉丁语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语言死亡，而是语言变态。”^[2]根据其理论，这两种语言是受到语言通常演变过程的影响，因此不是死亡或消失，而是演变成现代希腊语（Modern Greek）和当今的罗马语言。罗马语族属于印欧语系，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罗马尼亚语和罗曼什语。

研究者对语言死亡（language death）、语言灭绝（language extinction）、语言消亡（linguicide）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说明，产生了不同的术语，例如语言丧失（language demise）、语言移变（language drift）、语言替换（language shift）、语言替代（language replacement）等。语言学家对语言灭绝和语言死亡作了区别：说一种语言已灭绝，指该语言没有任何说话者；说一种语言已死亡，指一个社区内不再有说该种语言的人。与灭绝语言不同，死亡语言可能仍为科学、法律和宗教功能而使用。

语言死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整个社区说话者的突然死亡才导致一种语言的死亡（Craig, 1997）^[3]。“语言的彻底死亡”（radical language death）类似于语言的突然死亡（sudden death），通常由于受到政治镇压和种族灭绝而使大量人死亡。比如，1932年在法拉本多·马蒂领导下，在萨尔瓦多爆发种植咖啡的农民起义，印第安农民遭到残酷镇压，许多印第安人不得不停止使用自己的语言以免招杀害，致使印第安语和印第安人一起在萨尔瓦多灭绝（Nettle & Romaine, 2000）^[4]。

从类型上说，语言死亡可以是语言逐步死亡（gradual language death）、语言彻底死亡（radical language death）、语言突然死亡（sudden language death）、语言消亡（linguicide）、语言灭绝（language extinction）、语言自下而上死亡（bottom-to-top language death）、语言自上而下死亡（top-to-bottom language death）。后两者说明死亡起因于何处：自下而上语言死亡指的是语言变化发生在低层次环境，例如在家庭就不再用某种语言；自上而下语言死亡指的是语言变化发生在高层次环境，例如由于政府的政策而造成某种语言逐渐消亡。

说一种语言是死语言就像说一个人是死人那样。如果没有了人，无论如何语言也就不存在了（Crystal, 2000）^[5]。一种语言在最后一个说话人死亡之前，实际上就宣布它已经死亡。如果一种语言只有少数年长人会说，而在交际中不再使用，那么它实际上也已经死亡。这样一种语言就称为临终语言（moribund languages）。一旦某种语言已不再是孩子们的本族语，这种语言就无法生存。当一种语言死亡后，就会被另一种语言所代替。由于殖民化的结果，美洲一些本土语言就被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或荷兰语所代替。但是，有些语言死亡后，能够继续起到科学、法律和宗教功能，例如拉丁语与古希腊语被用来创造科学方面的新词，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新约希腊语（New Testament Greek）用于宗教场合。

虽然自语言产生后就存在语言死亡问题，但是对于语言死亡的系统研究是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一个相对新的课题（Craig, 1997）^[3]。可喜的是近30余年来，对这些被忽视的语言现象的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Crystal^[5]等语言学家均对语言的变化，包括语言退化、濒危、死亡、灭绝现象及其发生的种种原因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在死亡过程中的语言就是濒危语言。研究濒于死亡和灭绝的语言有时会打上“拯救语言学”（Salvage Linguistics）^[6]的标签。根据拯救语言学，对于一些正在消亡的语言，莫过于采用实地研究（fieldwork）的方法。研究者对濒危语言和即将灭绝的语言进行实地研究。挽救语言学的标准定量研究要受到所研究语言情景的严格制约，其定性研究则需要对最后几个说话人与打上衰亡烙印的语言的具体关系而定。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在短时期内用录

音等方法尽可能记录这种语言(包括语法和发音),并整理存档。例如,美洲土著语 Hän(哈恩语),属于阿萨巴斯卡语(Athabaska)。当 J. M. Maxwell 于 1969 年 6 月到达那里时,发现只有超过 50 岁的极少数人(大约 10 人)能流利地讲哈恩语,20 至 50 岁的成年人能够理解哈恩语,但同他们的父辈交流时只能用英语来回答,而他们的孩子只懂得和使用仅仅是个别的哈恩语单词,例如 gun' gun(owl)(Maxwell 2010)^[7]。

Krauss 是第一个意识到濒危语言涉及全球问题的专家。Krauss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就研究原始阿萨帕斯卡-艾克语(proto'Athapaskan'Eyak)^[8],并对 20 种阿拉斯加本族语进行研究。艾克语已于 2008 年灭绝。1992 年 Krauss 发表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世界上的语言处于危机中》)一文,指出世界上 90% 的人类语言在 21 世纪内将消亡或处于厄运之中,他告诫语言学家设法将这些语言作纪实性描写而存档(Krauss1992)^[9]。

应该指出,对濒危语言的研究不仅仅涉及语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Crystal (2000/2002)认为,

语言濒危问题现在需要前所未有的坚持,需要所有的手——学者、新闻记者、政治家、资金筹集者、艺术家、演员等^[5]。

二、Ethnologue 对语言的分级排序

世界上的语言到底有多少?

语言学家估计,大约在公元前 8000 年,可能存在着 2 万种语言(Krauss, 1992)^[9]。2009 年世界语言的数量是 6 909 种,而且还在急剧减少(Lewis 2009)^[10]。到 2100 年,预计有一半将会消失,当这些语言的最后一批使用者死去后,他们的言语也许会保留在某个积尘的档案馆中,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不会留下任何记载(Krauss, 2010)^[11]。

1974 年语言学相关网站 Ethnologue (民族语言)(第 8 版,编者 Barbara Grime)经过世界范围内广泛调查后列出 5 687 种语言^[12],2017 年 Ethnologue (第 20 版,编者 Simons & Fennig)列出 7 099 种语言^[13]。自 1974 年至 2017 年 Ethnologue 在各版中列出的全世界语言数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Ethnologue 自 1974 年(第 8 版)至 2017 年(第 18 版)列出的世界语言数量

Tab. 1 World Languages Listed by Ethnologue from 1974 (8th Edition) to 2017 (18th Edition)

年份	1974 年	1978 年	1984 年	1988 年	1992 年	1996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09 年	2013 年	2017 年
语言数量	5 687	5 103	5 445	6 170	6 528	6 703	6 809	6 912	6 909	7 105	7 099

1994 年 C. Mosely & R. E. Asher 在 *Atlas of World's languages* (世界语言地图册)列出 6 796 种语言^[14]。

Ethnologue 是由 Richard S. Pittman 创立的, Ethnologue 每年发布的信息和数据是由 SIL International 编制和发布的。SIL International 的前身是“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是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非营利性组织,其宗旨是为少数人种群体服务。从 1951 年起由“暑期语言学院”首先发布世界语言信息。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 SIL 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特别咨询地位。从 1974 年起 Ethnologue 每 4 年更新和发布世界语言的信息。

Ethnologue 在 2017 年对 188 种语言重新分类,从“消亡(extinct)”一类划分到“休眠(dormant)”一类,因为这些语言对它们以前的言语社区来说

仍具有象征性价值,并能提供语言复活的潜力。Ethnologue 在 2017 年对 188 种语言重新分类,在 Lewis 和 Simons 的 EGIDS^[16]基础上,把已经“消亡(extinct)”的 10 级语言提升到 9 级“休眠(dormant)”语言,认为这些语言对以前使用它们的语言社区仍具有象征性意义,同时“休眠”可以为这些语言的复活提供潜力。

当发现一种新的语言时 Ethnologue 也会在新版本中记述,例如夏威夷手势语(Hawaii' Sign Language, HSL)^[15]。该手势语是 2013 年 3 月 1 日由研究者在位于 Mānoa 的夏威夷大学宣布发现的。这样,在美国就有两种手势语,一种是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手势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另一种就是新近发现的夏威夷手势语。

针对濒危语言,2000 年 M. Paul Lewis & Gary F. Simons^[16],在 Joshua Fishman (1991)^[17]提出的梯度代际分级中断量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GIDS)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大的梯度代际中断量表(Expan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EGIDS),并运用EGIDS对世界上的语言从0级到10级进行分级排序,其中0级属于国际性语言,在各国的贸易、知识交换和国际政策方面广泛使用;1级属于全国性语言,在国家层面上为教育、工作、媒体和政府机构所使用,其标准性口语和书面语具有全国性功能;2级属于地区性语言,在这个地区其功能相当于1级语言;3级属于广泛交际的语言,也称作贸易语言,为众多的第一语言社区的成员所使用;4级属于教育语言,具有活力,并具有标准化形式,是学校教育的媒介语,也可能是少数民族语言说话人读写能力的第一语言;5级语言属于发展中语言,说话人的读写能力刚开始,其书面形式往往是非正式地传播;6a级语言是各代人面对面交际的语言,其处境较稳定;6b级语言是受到威胁的语言,正在失去使用者,其代际传播程度较弱,属于正在濒危的语言;7级语言是正在被替换的语言,是濒危语言,其占主导地位的语域正在减少;8a级语言是行将消亡的语言,其积极使用者是祖父母一代和老人,同时,父母一代人还能不流利地说这一级语言;8b级语言是几乎已消亡的语言,唯一能说8b级语言是祖父母一代或更老的人,但是他们相互间很少口头使用;9级语言是休眠的语言,人们有时说9级语言是礼仪性的或象征性的;10级语言是已消亡的语言,没有人再使用。从上看出,受到威胁的语言的6b级和正在被替换的7级语言最能代表濒危语言。

世界上不到4%的语言在国内取得官方地位。大部分语言因为没有书面形式而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只有小部分人使用,局限于在地方社区和家庭起功能作用(Nettle & Romaine, 2002)^[4]。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交际功能。从经济学角度讲,有些语言要比另外一些语言重要。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有大有小,使用人口越多的语言其社会交际功能越大,就越容易被其他民族或群体兼用,成为族际交际语。

三、语言衰亡正在加速

英国语言学家D. Crystal^[5]在2000年告诫人们,在当时世界现存的语言中,只有600种语言还处于“安全”状态,至21世纪末,整个世界将被

少数几种语言所统治。Crystal强调对濒危语言研究的应用性,提议创立一门应用保护语言学(Applied Preventive Linguistics),将濒危语言的理论、描写、研究方法等成果应用于具体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拯救上。1996年11月2日在美国中部语言学研讨会上R. Hale (1996)^[18]提醒与会者,全世界的语言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消亡,与会的许多语言学家表达了他们对濒危语言的关切。1992年Krauss^[9]预测世界上的语言有50%将会在一个世纪内逐渐消失,如今他的预言正在被验证。

语言丧失在美洲、非洲、澳洲、东南亚等地均已出现,特别在北美。美洲印第安语衰亡速度相当快。从1492年以来,北美的土著语言的消失已经数以百计(J. Crawford, 1995)^[19]。

从社会语言学和人种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语言衰亡与语言的某些功能的丧失紧密相关。其丧失的最主要的功能即语言在公众场合的交际功能和语域功能。例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的Cupeño语是一种黏着语,被认为已消亡。语言学家L. Hinton^[20]在1994年估计只有1至5人仍可以说Cupeño语。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起过重要作用的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等早已消失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共使用130种语言,其中,除了回族、满族已全部使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我国语言多样性保护形势也相当严峻。一些语言的使用人数逐渐减少,处于社会功能日益萎缩的衰退状况。据《浙江日报》2009年5月18日报道^[21],我国的满语、赫哲语、仙岛语、木佬语、仡佬语、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裕固语、塔塔尔语、土家语等语言已处于濒危状态。这些语言大多没有相应的文字,仅保留在山歌、传说等口头语言中,有的已基本丧失社会交际功能,仅保留在为数不多的老人中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孙宏开(2001)认为:“弱势语言的陆续消失是时代的总趋势,是语言学家们难以逆转的。在现阶段,应重视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抓紧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并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弱势语言向濒危状的转化。”^[22]

四、语言濒危和衰亡的原因面面观

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濒危和衰亡的具体原因作了各种探讨:例如由于语言使用者的死亡而造成一种

语言消亡;语言接触导致弱势语言衰亡;语言分化导致语言衰亡;语言转用导致语言衰亡;语言冲突会导致语言数量的减少;文化接触、文化冲突和文化同化导致语言衰亡;城市化和全球化导致语言衰亡,等等。但是,语言老化和濒危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语言本身,正如 M. Swadesh (1948) 指出的,决定语言死亡的因素最典型的是“非语言性因素”^[23]。对语言濒危和死亡的深层原因探讨如下。

(一) 语言衰亡的生物-生态观

语言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如同生物体,有其产生、演变、发展和死亡的过程。语言衰亡,就像物种消亡一样,语言从进化、发展、传播,退化、最终到衰亡。早在 19 世纪德国历史语言学家 A. Schleicher^[24] 就认为,达尔文研究动物和植物的方法基本上适合语言历史的研究,认为语言的发展过程与生物的进化过程是一样的。Schleicher 把语言分成孤立语、屈折语和黏着语三类,认为语言从孤立语经过黏着语发展到屈折语。Schleicher 采用生物学对植物的分类方法研究语言的亲族关系,建立语言发生学上的谱系树形图。谱系树形图指说明语系(family of languages)中母语和子语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语言的谱系树形图已为后人所采用。Schleicher 于 1863 年在《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一文中,用进化论解释语言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认为在语言的发展中有生、老、病、死各个演化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了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生态语言学来源于隐喻,研究语言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解释语言所嵌入的生态语境。1990 年语言学家 Halliday 在希腊塞萨罗尼基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强调语言与生物生长状况、种类特征以及物种形成之间的关系^[25]。生态学这个术语是由 Einarh Haugen 在 1970 年首次引入语言学的。Einarh Haugen (1972)^[26] 把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定义为“研究任何给定语言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把语言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为此,语言的多样性可以看成是语言生态,语言的濒危和灭绝则可以看成语言的生态危机。

自然界中具有生长、发育、繁殖直至死亡的物体都是生物,包括动物、植物、真菌、细菌、病毒等。作为一个生物体,语言的衰亡可以和物种消失相对比。语言是一个复杂系统,又是一个开放系

统。语素组成细胞词,细胞词组成名词、动词等形态实体,并形成句子和语篇层次的操作系统。语言的新词不断产生,旧词或取得新意,或消失。美籍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1983)认为:“语言本来不是一个代数系统,它是活生生的东西,是经过几十万年演变而来的,非常奥妙的活生生的东西。”^[27]当前,语言的生态发生危机,强势语言国家化和国际化已日益突出,变得越来越强。而弱势语言、土著语言和少数群体语言则处在趋于濒危,面临消亡的境地。

(二) 语言衰亡的社会观

语言衰亡的社会观认为,语言的衰亡是由于语言的外部因素和语言所处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为此,语言濒危和衰亡要指向语言的外部因素和语言所处的社会环境。法国语言学家 Calvet (1998)^[28] 从社会文化角度深入研究人类语言的衰亡现象,提出了“语言战争论”(language wars)的思想,认为语言发生变化和衰亡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语言衰亡的原因在于语言战争。语言接触和语言之间的冲突事实上也就是语言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当语言发生接触和冲突时,胜利者得以生存下来,失败者则灭亡。美国语言学家 R. Lakoff (2000)^[29] 针对语言战争论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战场(political battleground)。导致语言衰亡的决定因素是人类社会语言接触的不平等关系。英国语言学家 Phillipson 和丹麦语言学家 Skutnabb-Kangas^[30] 把这种不平等关系解释成“语言人权的剥夺”,他们认为,语言是基本的人权,几乎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能见到剥夺语言基本人权的现象,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遭受歧视。

五、弱势语言的模因观

当代已进入进化理论时期,出现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如进化经济学、进化心理学、进化语言学、进化认识论、进化计算机科学等。其中进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普遍现象。模因论(memetics)是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一种新理论,是英国生物学家 R. Dawkins 于 1976 年在 *Selfish Gene* (《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首先倡导的^[31]。此书对进化生物学、生态学和行为科学有

着巨大的影响。Dawkins (1986) 指出:“模因是存储于人脑中的信息单位。模因自我复制的途径是从一个人的大脑复制到另一个人的大脑。”^[32]模因论是研究文化信息传递的进化模式。模因类似于基因,是思想或文化的单位。人类语言是模因的载体,言语交际过程本质上是模因的传播过程,交际中语用推理的过程也就是语言模因从产生到复制到传播的过程。Blackmore (1999) 把语言的产生归因于模因和基因的双重选择。当人们互相模仿时,模因就产生了。在模仿中,高质量模因在竞争中存活下来^[33]。何自然(2007)指出:“语言本身就是模因,模因主要寓于语言之中。任何字、词、语句、段落乃至篇章,只要能够得到复制和传播,都可以成为模因。”^[34]模因的复制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模因死亡,只有小部分模因能存活。F. Heylighen (1998)^[35]提出成功的模因随之而来的4个阶段:同化、保留、表达和传播。同化指模因必须能进入寄主的记忆中,并被寄主注意、理解和接受。保留指的是模因必须保留在记忆中一段时间,否则就不叫模因。表达指模因要用语言、行为等形式表达出来。传播指模因的传输需要媒介或工具,例如讲话用语音来传输。当前,由于大众媒介的发展,模因复制的传播阶段尤显重要。模因的特征是长寿性(longevity)、多产性(fecundity)和复制保真度(copying-fidelity)。模因有强弱之分,Dawkins (2006)指出,有许多模因之所以能够在自我复制的竞争中获得成功,主要是受长寿性、多产性和复制保真度三个因素的影响^[36]。因此强势语言具有强势模因的特征,而弱势语言正好相反,其特征是弱势模因,在语言的传承中具有短命性、低产性,并在传播中产生失真性和变异性。语言的生命力依赖于语言模因的复制能力和传播能力,而濒危语言就失去了复制能力和传播能力。为此,弱势语言必须有稳定数量的寄主群体,要长期地被人们记忆和存储才能存活。而当前弱势语言并没有这个条件,相反,相当多的弱势语言因此而成为濒危语言。

六、结束语

语言濒危和死亡是一种全球现象,其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一些语言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这是人类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事物的发展总是两方面的,有语言濒危和死亡,就有语言复兴

(language revitalization)以拯救濒危和死亡语言。语言复兴受到语言学家和广大人士的关注。例如,亚拉姆语(Aramaic)是世界上存活了上千年的古老语言之一,是耶稣所操的语言。亚拉姆语属于闪族语系,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据美联社2004年2月23日报道,电影《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在美国首映。为了拯救快要消失的耶稣的语言——亚拉姆语,影片使用的对白是原始亚拉姆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而且没有字幕。剧中的犹太角色的台词全部被翻译成公元1世纪时的亚拉姆语,而剧中的罗马人所讲的是拉丁语,因此影片的历史真实感非常强。但是语言的复兴是极其艰难的事,至今,只有一种语言得到复兴,这就是希伯来语(Hebrew)^[37]。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的民族语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过去的2500年,希伯来语主要保留在《圣经》中。1890年,埃里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 Jehudah, 1858—1922)号召犹太人说希伯来语,并成立了一个希伯来语委员会,该委员会最后发展成为希伯来语研究院。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复兴的希伯来语成为在以色列通用的现代希伯来语。

参考文献:

- [1] Hieber D. Why Do Languages Die? [EB/OL]. (2012-01-04) [2017-08-01] <http://mises.org/daily/5846/Why-Do-Languages-Die>.
- [2] McMahon A M S. Understanding Language Chang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 Craig C G.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degeneration [M] // Coulmas F.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 [4] Nettle D, Romaine S.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Crystal D. Language Deat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6] Kroeber A L. Notes on the shoshonean dialect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J]. UCPAE 8, 1909(5): 235-269.
- [7] Maxwell J M. Training graduate students and community members for native language documentation [M] // Grenoble L A, Furbie N L. Language Documentation: Practice and Valu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10.
- [8] Krauss M E. "The proto-Athapaskan-Eyak and the problem of Na-Dene: the phonolog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964, 30(2): 118-131.

- [9] Krauss M E.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J]. *Language*, 1992, 68(1): 4-10.
- [10] Lewis M P.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M]. 16th ed. Dallas: SIL International, 2009.
- [11] Krauss M E.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M] // Moseley C.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3rd ed.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10.
- [12] Grimes B F, Pittman R S, Grimes J E. *Ethnologue* [M]. Dallas: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1974.
- [13] Simons P, Fennig C D. *Ethnologue* [M]. 20th ed. Wikipedia, 2017.
- [14] Asher R E, Mosely C J. *Atlas of World's Languages*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 [15] McAvoy A. Linguists say Hawaii Sign Language found to be distinct language [N]. *Washington Post*, 2013-03-01.
- [16] Lewis M P, Simons G F. Assessing endangerment: expanding Fishman's GIDS [J]. *Romanian Review of Linguistics*, 2010, 55(2): 103-120.
- [17] Fishman J A.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1.
- [18] Hale K. The intellectual necessity of language diversity [C] //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1996 Mid-America Linguistics Conference*.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6.
- [19] Crawford J. *Endangered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What is to be done, and why?* [J]. *The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1995, 19(1): 17-38.
- [20] Hinton L. *Flutes of Fire: Essays on California Indian Languages* [M]. Berkeley: Heyday Books, 1994.
- [21] 李蓝, 裴钰. 语言濒危, 方言告急 [N]. *浙江日报*, 2009-05-18.
- [22] 孙宏开. 关于濒危语言问题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1): 1-7.
- [23] Swadesh M. Sociologic notes on obsolescent languag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948, 14(4): 226-235.
- [24] Schleicher A. *The Darwinian Theory and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C] // Koerner E F K. *Linguistics and evolutionary theory: Three Essays by August Schleicher and Wilhelm Bleek*.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V, Bickers W.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863.
- [25]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analyzing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6): 7-36.
- [26]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27] 王士元. 语言的演变 [M] // *语言学论丛* (第11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28] Calvet L J. *Linguistique et colonialisme: petit traité de glottophagie* [M]. Paris: Payot & Rivages, 2002.
- [29] Lakoff R T. *The Language War*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30] Skutnabb-Kangas T, Philipson R.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Overcoming Linguistic Discrimination* [M].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5.
- [31] 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32] Dawkins R. *The Blind Watchmaker* [M]. Harlow: Longman, 1986.
- [33] Blackmore S. *The Meme Machin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4] 何自然. 语用三论: 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35] Heylighen F. What makes a meme successful? Selection criteria for cultural evolution [C] // *Proceedings 1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ybernetics. de Cybernétique*, Namur: Association Internat, 1999: 418-423.
- [36] 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7] Fellman J.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Tongue: Eliezer Ben Yehuda and the Modern Hebrew Language*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73.

(编辑: 朱渭波)